

## 理论探索

## 做人工智能做不了的文艺批评

□王一川

在数智时代,人类文艺批评不必再和数智技术比速度、比全面和比“顺滑”,而是要集中精力做这样一件事:依托中国人的“文心”传统,以生命体验、社会关怀、通史视野和原创个性,去赋予作品以灵魂性意义,说出人工智能永远说不出的“人话”。一言以蔽之,以“文心”熔铸数智时代的批评魂

我们今天做文艺批评,最稀缺和最需要加强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由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叠加而成的被称为数智时代的时代,也就是数字化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深度叠加、有机融合并发生系统性质变的新型社会技术时代和新型历史阶段。这个时代正以全域数字化为基础设施,以通用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实现数据要素化与智能普惠化的双向赋能与闭环演进,从而为文艺批评带来极大的“诱惑”和挑战。

确实,今天这个数智时代正在给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带来极大便利。给文艺创作带来的暂且不说,单说给文艺批评带来的极大便利,这是今天每位文艺批评从业者都已经和正在感受到的。我们可以运用数字化技术在海量承载、无损留存、集约存储、瞬时检索方面的突出优势,随时获取和构筑坚实的文艺批评文献资源基座。譬如,依托一个大容量的移动硬盘,我们就可以随身储存和携带海量文献去旅行,而不再需要随身携带大量笨重的书籍。我们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平台在艺术品文本分析、风格量化、互文溯源、观众反馈数据等方面展现强大的能力,为文艺批评开辟出精准高效的定性兼定量的阐释路径。譬如,人人都可以通过人机对话,立刻写成一篇文章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文艺批评文章,如此从事文艺批评仿佛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种相反的失落和沮丧:批评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储存和携带固然便捷,但看似漫无目的的自由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乐趣消失了,而且自由阅读和独立思考中孕育的具备强劲且长远效应的原创力积蓄和叠加,必然也随之消失。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撰写的文字,固然快捷,但有可能充满虚构、虚假、造作,缺乏自我反思及批评能力。这就让我不得不思考:这样的数智时代已经、正在和将要给我们的文艺批评带来什么,而我们又需要对此做出怎样的智慧应对?

我想到的不是,如果说,2025年是数智时代文艺批评元年,那么,从此我们就已经走上一条不得不随时随地同日益先进、便捷和神奇的数智技术打交道的漫长旅途。而近两年来的初步尝试,已经完全可以让我们产生和铭记一些沉痛的教训了。数智时代文艺批评很便捷,但同时也很糟糕,因为它已经正在严重地降低我们人类的批评智能或智商。它通过数字化海量信息储存和携带而消解我们的自由阅读和思考空间,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我们对自主原创力的涵养。同时,过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写作,并且没有进行有效的选择和反思,会影响我们的批评能力的提升和改善。这无疑是我们人类的文艺批评能力的极大损伤。我的结论是,长此以往,人将无力进行真正的评文品艺。怎么办?当前我们应该做的事很多,现在我想到了其中的一点:以“文心”熔铸批评魂。

我们应当重新发扬中国式“文心”传统,让它成为我们的文艺批评之根脉。中国人谈文艺固然讲究同时包含形式和品德的“美”,但更重视容纳天地人精华以及人的“心性”的“文”和“文心”,秉持“尚文”精神而展开文艺批评。同时,我们还应当敢于熔铸一颗能够同人工智能展开对话和较量的人类批评魂,简称“批评魂”。批评魂这三个字,应当成为数智时代人类文艺批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阵地和堡垒。人工智能可以有文笔流畅的文魂、知识渊博的学魂,但唯独没有批评魂。人工智能可以有表扬,但缺乏自主的批评;可以有“有”(to be),但没有“无”(not to be)。To be or not to be,“在”还是“不在”或者“有”还是“无”,这是人类才有而机器没有的生存疑难。批评魂,在这里代表人类自我反思、自我批评或自反能力,代表生命之痛感、时代之担当、精神之独立、思想之锋芒等的相互叠加和化合。同人工智能只有算法而没有骨血、只讲逻辑而缺乏爱和恨、有知识库存而没有历史记忆和现实痛感相比,人类需要带着批评魂的血性和精灵去担当数智技术冲击下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患和出路叩探之责。

我们人类应该如何以“文心”来熔铸自己的批评魂?我想到了下面几个核心方向,感觉它们应当成为数智时代人类文艺批评的立身之本。

一是溯源至本民族底蕴深厚的“尚文”精神和“文心”传统。召唤“文心”传统,由它统领“美”“美感”等现代美学与艺术学范畴,让正面临无可归命运的当代艺术美重新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是投入真实的生命爱憎喜乐。人工智能没有人生的痛苦和爱憎,也缺乏时代创伤与记忆,而人类批评的价值在于,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发现和应和作品中的生命体验,实现灵魂层面的深度对话。我们要做的不再是像人工智能那样复述情节与技巧,而是说出作品让我想起自己亲历的某个时代、某个人、某种无法言说的隐痛和欢乐。这种不可复制的个人体感或深度生命体验,是人工智

能永远写不出来的。

三是表达现实的人间关怀和社会伦理评判。人工智能追求价值中立、周全和不得罪人的四平八稳,往往给出温和而正确的“废话”。而真正的文艺批评,总是有锋芒、立场和责任担当,敢于指出作品价值盲区、批判时代审美病象,同时敢于为被忽视的弱者及被遮蔽的真相发声。当然,人工智能依托人类的指令,也可提供尖锐的批评。但这种批评缺乏活生生的批评主体的支撑,往往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此,作为人类主体,我们应当带着“致良知”的“心性”去作出准确评判。

四是深耕通史原野与独立思考谱系。人工智能可以罗列知识点,但很难建立广博深厚的通史和跨学科思想史脉络。人类批评的优势在于,把一部作品放进漫长、宏阔而又深厚的艺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平台上重新定位,看清它在历史和传统中的传承和创新脉络,以及在时代中的位置与价值。这样构建起来的宏观视野下的独特判断,具有贯通古今、汇聚中外的思想穿透力,远非简单的信息拼接或算法等式可比。

五是提出富于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范式。人工智能擅长利用现有理论而不擅长创造新理论。人类批评家的真正制高点在于,提出原创批评概念,建构新的解释框架,为一个时代和一类作品的价值命名。正像孔子的“诗可以兴”,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谢赫的“六法论”、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体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那样,也正像别林斯基、勃兰兑斯、弗莱、本雅明、罗兰·巴特、杰姆逊等批评家的工作那样,我们应当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尽力作出自己的原创性建树。

六是守护独特的批评风格和人格。人工智能文风可以“丝滑”,但很难有不可替代的个人风格与人格魅力。我们可以写出锋利如刀的短评、诗意交融的随笔、学者式严谨的长文、充满个人气质的批评文章。这种“风格即人格”的东西,正是人工智能无法模仿的人类灵魂标识。

在数智时代,人类文艺批评不必再和数智技术比速度、比全面和比“顺滑”,而是要集中精力做这样一件事:依托中国人的“文心”传统,以生命体验、社会关怀、通史视野和原创个性,去赋予作品以灵魂性意义,说出人工智能永远说不出的“人话”。一言以蔽之,以“文心”熔铸数智时代的批评魂。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书评

注意到傅逸尘对“新红色经典”相关论题的研究,缘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6期发表的《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建构“新红色经典”的现实意义与文学想象》。后来,又读到他的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可见,傅逸尘对这一论题的建构与思辨是持续深化、拓展递进的。该书采用历史梳理、理论建构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革命历史再叙事”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系统阐释新时代文学的新观念、新变化、新经验。

《“新红色经典”论》的首要特征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新时代文学产生、发展的现实语境,以“人民史诗”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文学“属己的思想和灵魂”,观照当下方兴未艾的“新红色经典”创作现象。换言之,作者的历史意识、研究基点和方法具有“同时代”批评的高度自觉。为此,作者在专著第一章梳理了从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到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再到2021年的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的核心精神,进而谈到,“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内涵,那就是“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梳理清楚新时代文学的理论基础、逻辑脉络和实践方向,搞明白当代文艺的新方位,就会知道作者写作此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傅逸尘试图以此为案例进行追问:何以成就“人民史诗的文学”?

“红色经典”的说法,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它是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的一种追认。那么“新红色经典”之“新”有着怎样的意涵?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书中的几个重要概念:一是“人民史诗的文学”,二是“革命历史再叙事”,三是“新红色经典”。在作者看来,“人民史诗的文学”是对“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的回应,包含三个本质性元素,分别是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的“史诗性”(囊括革命历史与当下现实两个阶段)、“史诗”的文学形式与艺术品格,以及写出“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所内蕴的思想、精神和灵魂,为世界文学提供独特的文学经验。作者从书写对象、艺术追求和精神向度三方面,初步提出了“人民史诗的文学”的特征。具体来说,“人民史诗的文学”涵盖近年来十分突出的两个文学潮流:一是反映脱贫攻坚、新乡巨变题材的作品,二是集中涌现的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后者因与“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小说”有别,被作者称为“革命历史再叙事”,而“革命历史再叙事”中的优秀作品,被进一步命名为“新红色经典”。综观这三个概念,“人民史诗的文学”涵盖更大,昭示着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创作方向;“革命历史再叙事”承续延安文艺、当代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深厚传统,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风貌和气质;“新红色经典”同样是置身新时代文学语境的一种命名,它既与以往的“红色经典”在人民性上一脉相承,又因富于时代内涵的历史观与艺术特质,而具备“史诗性”的潜质。

从上述辨析中可以清晰看到傅逸尘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建构意识。这种富有新意和建设性的命名并非概念的空转,而是从文学现场提炼出来的。《“新红色经典”论》不仅完整回顾了革命历史叙事在延安时期、“十七年”“文革”、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演进脉络,而且以细腻的文本分析,铺展开新时代“革命历史再叙事”的斑斓图景。在第三章中,作者分七节深度剖析了徐怀中《牵风记》对“超验主义”的探索与超越,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先锋姿态”与零度写作,徐贵祥

## 对一种理想文学类型的建构

——评傅逸尘《“新红色经典”论》

□张鹏禹

《英雄山》“知识分子叙事”的现代性,海飞谍战小说的“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融合,等等。在对十余部优秀作品、文本细读中,傅逸尘印证了“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延续性与断裂性。其典型特征在于,作家在时过境迁之后,将“革命历史”及其后的“现实境遇”打通为一个连续的时空统一体来处理,进而开拓出丰富复杂的多元面向。而作者之所以如此重视“革命历史再叙事”以及可能从中诞生的“新红色经典”,恰恰在于这类作品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凝聚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精神动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新时代的革命历史创作潮流同样具有激励与鼓舞人民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的叙事动能。与此同时,作者并没有将“革命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再叙事”等量齐观。某种意义上,“革命历史再叙事”在继承“革命历史小说”人民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后者存在的一些非文学性因素的超克。由此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是哪一种文学整体观,用打通、连贯和统一的视角、标准,相对客观地审视了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演变,而非厚此薄彼,用后来者反对先行者。这种历史唯物论的态度,既使我们看清了某种文学形态存在局限性的深层原因,也能使人明白对所谓“革命历史”的书写和征用有其稳定内核。

尽管此书名为“‘新红色经典’论”,但我更愿意把“新红色经典”这个理论命名视为一种孕育生成中的、寄寓作者思辨与期待的新的文学类型。与形成相对稳定内涵的“红色经典”相比,尽管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优秀作品,但作为一个新的概念与命名,仍需接受文学史和批评界的严格检视。对此,作者自身也有着清醒认识。在书中,他多次申说“新红色经典”的命名本质上是一个建构问题。作者认为:“建构‘经典’,只是‘经典’被确立的过程,而不是‘经典’被确立的结果。”“笔者提出‘新红色经典’的理论命名,不仅基于对当下文学场和代表作品的阐释与细读,亦是对新时代中国文学创新发展的思辨与前瞻。”这样的做法,也有文学史经验可以佐证。比如五四新文学就是先有理论倡导和阐发,再有创作实绩。也就是说,“新红色经典”的提出更是对理想型作品的命名。其内涵,作者概括为五个方面,即时代之“新”、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新”、历史观念之“新”、文学方法之“新”、创作主体之“新”。时代之“新”自不待言,中国人民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时代赋予作家底气和文化自信,使其能以更加平等开阔的眼光面对历史、现实与世界。第二个“新”则锚定“人民”和“史诗”这两个关键词,意在凸显以史诗品格写出时代精神。其他的几个“新”则与“大历史观”、形式探索、作家代际更迭紧密相关。

在我看来,《“新红色经典”论》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学命题,比如:“人民史诗的文学”到底指什么作品?“史诗性”在“十七年”“红色经典”的评价中就已使用过,这种评价是否贴切?如何看待“红色经典”与“革命历史再叙事”之间的关系?参照“红色经典”也包含农村题材小说的经验,“新红色经典”更多地指向革命历史题材是否完整?傅逸尘以研究当代军旅文学的深厚基础,结合对新时代文学的跟踪研究,奉献出一部带着理论锋芒和探索勇气的理论专著。尽管从内容看,这本书尚有待继续完善和持续深入探索的空间,但它的的确确能启发我们去探索那些新时代文学研究亟待阐发的真问题。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 了一容《野菊花》在京研讨

本报讯(记者 康春华) 近日,由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宁夏文学艺术院(《朔方》编辑部)、宁夏作协和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从《圈马谷》出发——了一容中短篇小说《野菊花》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以书面形式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宁夏文学艺术院院长闫宏伟,《中国校园文学》主编王昉,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何志明,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该书作者了一容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徐峙主持。

《野菊花》2024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圈马谷》等12篇代表作。这些作品从敬畏生命与自然的视角出发,延续作者关注社会现实、以诗化语言反映人性与人生的艺术风格,饱含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深远的忧患意识。

邱华栋表示,了一容早年牧过马、淘过金、当过油漆工,生活锻造和历练了他,使其笔下的西部自然、社会有独特的个性和创作印记。在创作生涯中,他始终亲近自然并以自然为师,文字具有很强的爆发力和积极向上的热力,尤其以《圈马谷》为代表的小说展现了催人奋进的力量感,体现了一种永不屈服、向上生长的精神。

与会者谈到,《野菊花》宛如一幅铺展在西北大地上的生活长卷,将笔触伸向草原牧人、市井艺人、乡村农民、网络主播等群体,记录他们的坚守与梦想,在朴素叙事中挖掘人性,用充满生活质感的文字构建起一座连接地域文化与人性的文学桥梁。作者将西海固及草原地域经验转化成对普遍性生态问题的深刻洞察,在自然审美与生态伦理的深度融合中实现了思想的深化。

## 八方文讯

## 展现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中国方案

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云南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彭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云南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赵虎,云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银和,以及近20位专家学者与作者陈启文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梁鸿鹰主持。

《穿越人间的象群》以云南野象群北上南归为核心,深度展现了中国在物种保护、人与动物和谐共处方面的智慧方案。与会专家认为,陈启文以细腻的笔触将看似重复的村寨走访、守护大象的日常写得鲜活动人,让动物叙事与人文关怀相交融,使整个文本既成为象群的迁徙史、生存史,更成为守护大象的基层工作者的命运志。同时,作品还深入剖析了亚洲象的进化史与中华象的文化史,既探讨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命题,又彰显了美美与共的中国智慧,引人深思。

(杨茹涵)

## 新时代长诗研讨会系列活动举办

新时代长诗研讨会暨“诗意滨湖·长歌万里”主题采访创作活动日前在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举行。活动由诗刊社、无锡滨湖区委宣传部、无锡日报社主办。吉狄马加、李少君、霍俊明、贾梦玮、陈虎、朱琰、周蓓蓓、高祥生、黑陶等60余人参加。

据介绍,在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主办的2024至2025年度“新时代长诗奖”评选中,尚仲敏的《少年》、宋耀珍的《红》、谷禾的《周庄本纪》、麦笛的《赵一曼》、陈人杰的《喜马拉雅》、王学芯的《玻璃屋》、邹胜念的《青海湖》获奖。在新时代长诗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深入分析了这些获奖作品的思想艺术特色,并呼吁更多诗

人以长篇诗作抒写时代的山乡巨变。

## 专家研讨张中海诗集《农事诗》

近日,以“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诗意纵深”为主题的张中海诗集《农事诗》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山东省作协、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赵艺丁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农事诗》是一部“以农具为笔、泥土为墨”写就的农民生存实录,也是“农事百科全书诗化的体现”。诗集中的作品既有壮阔的时代叙事,又有细腻深沉的个体经验,展现了诗人对土地从逃离到敬畏的心路历程,捕捉了那些被城市化浪潮卷走的耕作声与烟火气,并赋予其新的生命根系,记录了新时代乡村的变迁、劳动的尊严以及生命的质感。张中海谈到,希望通过诗歌留住那些正在消逝的农耕记忆,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留下珍贵的诗行。

## “与文学同行·阅在文学馆”首期活动举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读书日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4月4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文学同行·阅在文学馆”首期活动在京举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以馆藏珍品故事为切入点,为读者带来一场精彩的共读分享,通过讲述《透明的红萝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手稿背后的动人故事,鼓励大家亲近文学、热爱阅读。

活动设置了朗诵分享、书籍介绍、知识竞答、图书漂流等环节,现场气氛温馨热烈。朗诵分享环节以声传情,活动参与者的诵读诠释了文字背后的丰富意蕴,传递了文学的温度。书籍介绍环节,多位读者分享了各自喜爱的图书,内容涵盖祖国山河、自然生态、时间哲思、爱的体悟以及儿童成长等丰富主题,真挚的情感引发了全场共鸣。知识竞答环节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常识展开,现场观众踊跃抢答。图书漂流环节则以书为媒搭建共享桥梁,让书香在流动中延续传递。

## 《民族文学》读刊会聚焦“大地与诗”

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主办、《民族文学》广西大化创研中心协办的《民族文学》“大家读刊”第10期读刊会日前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活动以“大地与诗:她们笔下的柔韧与辽阔”为主题,聚焦当代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创作。《民族文学》副主编杨玉梅、《民族文学》广西大化创研中心负责人韦慧、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于昊燕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作者、读者和译者代表参加。

《民族文学》2026年第3期推出了陶丽群的小说《收割季》、朴草兰的小说《伊基达的礼物》、绿窗的散文《悲伤与理智的花朵》、鲁玉梅的散文《星星的河流》以及“万事万物在她那里契合·女诗人辑”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与会者围绕这些作品谈到,女性作家以小说的多元开阔、散文的细腻温润、诗歌的凝练隽永,书写对地域文化薪火相传的执着坚守、对人性本质的深度探索,更饱含着对生活最本真的赤诚热爱,体现出一种既柔韧又辽阔的创作风貌。

## 探寻新女性写作传统的精神源流

日前,西湖讲坛第二讲在浙江杭州西湖大学文学院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张莉以“新女性写作传统的源流”为题,聚焦萧红其人其作,带领线上线下读者共同探寻文学长河中的新女性力量。活动由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副教授叶子主持。

何为“新女性写作之新”?张莉认为,是新的视角、新的风景和新的语法。面对百年文学传统,萧红将曾经无法被展示的女性生命体验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把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经验,让无数读者领略到当时女性的处境。萧红的写作坦然、诚实、诚挚、朴素,而真正的女性写作者,要借用女性视角完成对人类处境的理解。叶子表示,萧红用自己的血液、温度、气息写作,都是女性视角的真诚呈现,其创作正在不断拓宽我们理解世界的维度。与会嘉宾寄语青年写作者从萧红等前辈作家身上汲取传统,在日常生活与旷野、宇宙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声音。

(康春华)